

# 彻查封口费是记者节最好的礼物

【媒体思想之李鸿文专栏】

今天是记者节，这个节日的重要意义，在于激发荣誉感和使命感，提醒新闻人要恪守职业道德。

可就在前不久，曝出了封口费的丑闻，给记者节添了堵。霍宝干河煤矿向23家“媒体”的28名“记者”支付了12.57万元的费用。这其中虽有假冒记者，但拿正规“执照”的真记者也不在少数。但这还不是全部名单，据山西省委宣传部负责人介绍，涉事的媒体和涉事记者远比公布的要多。更丢脸的是，他们竟和假记者一起形同乞丐般排队领取出事煤矿的赏赐和打点，做起“有赏不新闻”的勾当。

继山西繁峙矿难“金元宝”事件后，霍宝干河煤矿这起封口费事件再一次让新闻界蒙羞。管理部门最近表态，要严肃处理这起事件，对管理不严、甚至鼓励记者搞“有偿新闻”的单位进行停业整顿。

同样的表态在“金元宝”事件后也曾耳闻。如果不能建立真正意义上的惩前毖后的究责机制，如果不能建立使命感和崇高感的新闻职业伦理，如果不能进一步完善信息披露机制，这起封口费之后，还会有更多的封眼费、封耳费和封手费。而所谓被“处分”的记者，改头换面后，还会混迹于新闻界。那些被“整顿”过的媒体，重新包装后还可另起炉灶。

新闻追寻真相，新闻界的新闻，更应向社会还原真相。现在山西省方面分期分批公布名单，也许是因为在继续调查，要掌握充分证据。

但究竟是哪些媒体的哪些记者收了封口费，究竟有多少家媒体的多少名记者收了黑心钱，社会期待调查结果出来后公布全部名单，而不是选择性公布和处罚。如果这样，那就是新闻界的“瞒报新闻”，与黑心矿主的瞒报做法并无差别。

作为新闻界的一名老兵，我强烈呼吁以严格的行业禁入制，清除这些害群之马。没有敬畏，哪来崇高？没有职业信念，哪来职业操守？体育界有终身禁赛的先例，对这些职业败类，我这里主

要指的是涉事媒体，就应该借鉴体育界的做法，将他们永久逐出新闻界。

过去也有一些处罚措施，但给人的感觉是，技术上的错误往往处罚较重，显得铁面无私；而对违背职业伦理的错误，往往手下留情。最终的结果就是，这种处罚力度上的不恰当“柔情”，助长了歪风邪气。

封口费事件让新闻人蒙羞，给记者节添堵，但对这一事件的曝光和处理，却是送给记者节的最好礼物。以此事件为标本，真正落实信息披露机制，真正反思管理思维，那么，新闻人才能更有尊严，新闻人也才能更有感召力。

(作者系资深时事评论员)

# 谁都不能做自己的法官

【中国日记之童大焕专栏】

在11月1日下午举行的《警察执法与公民维权冲突协调问题》研讨会上，公安大学教授周欣提出哈尔滨命案有可能推动中国鉴定制度。最新的消息是，11月6日下午，经有公安部专家等各方参与的尸检，结果显示，林松岭系被殴致死，已有两名涉案警察被提请批捕。

周欣教授指出，哈尔滨警命案引发出一个共性问题就是鉴定问题。我国鉴定制度是从有利于打击犯罪的思想下规定的，所以决定权一直在官方，不在老百姓这儿，老百姓只能申请重新做鉴定，但没有自己自主做鉴定的权利。警方出了事之后，自己找人做鉴定，就是一个非常公正的公安机关，他们的可信度也会大打折扣。在哈尔滨警命案中，警方迫不得已同意了当事人自己请的两位鉴定人参与鉴定，在以前从来没有过的，应该推动中国鉴定制度变革。

在哈尔滨警命案中，相关回避制度、鉴定制度的缺陷我们已经看得很清楚：明明是自己派出所干警出了事，还由自己调查，这本是整个涉案单位必须集体回避的问题，在绝大多数时候却没有回避。于是才会不断出现录像视频选择性公开等令人生疑的事件。江西鄱阳县报警人被警方击毙案件中，相应的回避制度仍然缺失得令人心惊。该案已经被江西省列为“头号督办铁案”，但8个月过去，下令开枪的王副局长仅仅被免职。而案发后死者先被殴打的鄱阳宾馆4楼的摄像头被鄱阳警方拆离，录像至今没有公布。其实无论是哈市命案还是鄱阳的案件，制度上

如果强迫当地警方回避，两起事件都不会发酵得如此厉害。

任何人都不能做自己的法官，类似的回避制度，不仅仅在刑事和治安案件中广泛需要，在备受关注、矛盾重重的医患纠纷中同样需要。众所周知，我国的医患纠纷在看病贵、看病难的催化下有愈演愈烈之势，甚至纠纷暴力化解决的倾向也越来越明显。造成这种现象最重要的原因，是医疗纠纷缺乏独立的鉴定机构，缺乏医、患、保险三方都认可的理赔依据。

解决医患纠纷的当务之急，不是医疗责任险的全面推开甚至强制执行，而是建立权威、独立的医疗事故责任认定第三方，提高医疗事故责任认定机构的权威和公信力。目前，一些地方的卫生局正在与司法局等相关部门协调，探索研究成立医疗纠纷调解中心，作为医疗纠纷调解和认定的第三方机构，在协调医疗纠纷中行使独立调查权和定损权。

但是，由卫生部门来牵头组建这个“第三方”机构，公信力和权威性仍将受到质疑。因为现在各级政府卫生部门，并没有走出既办医院又管医院的制度陷阱，仅此一条，就很难让人相信，一旦出现医疗事故或者纠纷，由其指导、组建的“鉴定第三方”能够完全站在中立的立场上平衡医院和患者的利益。

有独立的利益才有独立的立场。我们真正需要的不是医疗纠纷调解中心，而是真正独立的医疗纠纷鉴定中心。该机构应该由地方政府而非卫生部门直接组建，或者由市场中公平竞争的民间机构来完成，用邻近地区的权威专家建立专家库，随机抽取，当地专家则应全部回避，如此，才能给各方对公平的信心。

(作者系资深时事评论员)

# 限价房销售要远离权力猜想

■热点纵论

有些事情，是注定要挨骂的。郑州要将首批限价房定向卖给无房警察，就是一件讨骂的事。

11月7日的《河南商报》报道，郑州首批限价房试点将于年底动工，房价将比周边商品房便宜20%左右。不过，首批限价房属于定向建设，主要面对公安干警中的无房家庭。郑州市房管局副局长李保华解释说：第一批限价房之所以圈定公安干警中的无房家庭，主要基于两点原因：其一，许多公安干警中很多人还是无房户，住所分散不利于他们快速出警、快速打击犯罪；其二，这些地块本身就属于公安系统，此次是由公安系统提供出

来进行试点的。

网上的骂声毫无意外地响亮，这并不奇怪，“不患寡而患不均”是人们对社会公平最朴素的信仰，但这样的一条消息，却很容易就会让人联想到权力向权力的献媚，牺牲的恰恰是人们对公平的信心。

郑州市房管局提到了“定向销售”的两条理由，但实在都提不上台面——缺房子的不仅是当地的警察，即使这块地属于公安系统，那内部盖房给员工做福利也应该是警方的事，不应该以“限价房”这样事关全民的政策姿态出现，房管局更不应该掺在里面。

其实无论从什么角度来看，警察都不应该是最缺房子的人，至少，他们属于国家公务员，收入比较稳定，各项福利待遇也比较齐全。相比于那些没有房子的警察，那些低收入者当然更需要限价房，更需要政府提供帮助以改善他们的生存状态。虽然限价房有别于经济适用房和廉租房，但仍然是政策性保障住房，它的销售对象，应该是那些够不上标准申购经济适用房的低收入者，无论如何，收入稳定且不算低的警察，也不应该被划在销售范围之内。限价房作为一种福利，其销售顺序只能以家庭收入高低为准，而不是这个群体手中的权力大小。而以家庭收入论，比警察更需要这批限价房的群体，显然有的是。

现在的问题，不是郑州要卖多少套限价房给那些无房的警察，而是这样的定向销售折射了一种危险的政策走向——权力者比普通百姓更容易享受政策红利。其实郑州首次限价房定向销售的对象如果换成别的公务员，相信骂声也会一样多，这其实是人们对权力的一种天然警惕。相比普通百姓，公务员手握权力，也拥有更多社会资源。与此相对应，他们利用手中的资源交换利益的空间也就越大，好的制度安排，应该是尽量压缩权力者这种资源换利益的空间，而不是反而进行放大。

郑州市首批限价房定向销售给无房警察的政策，恰恰放大了人们对这种“权力换利益”的猜想，也极大损害了限价房政策赖以存在的公平基础。这种公共政策“权力溢价”的倾向，实在是危险得很。

(尹之)

# 国家质检总局：进入中国市场的澳优能力多奶粉是安全合格的

## 港大当姚明粉丝符合“树人”目标

■公民发言

11月6日，香港大学公布，将向克林顿、何大一、姚明颁发名誉博士学位。

很多不满者其实都很清楚，这只不过是一种褒奖，无关学术水平——港大也说得非常明白：是为表彰他对运动及推动国际社会对艾滋病的关注所作出的贡献。真正令他们看不顺眼的，是该埋头做学问的港大不务正业。

对于这样的忧心忡忡，我能理解。的确，港大给姚明颁发名誉博士学位，与求真同学的“主营业务”基本无关，倒有些像追星族或名人跟班，难免攀龙

附凤、哗众取宠之嫌。但在立场上，我支持港大，因为如此“旁门左道”表达了港大的一种态度：尊重那些造福于社会的人。

如果我们承认，滚滚红尘间，追求自己的利益而不损害他人的利益是做人的底线，那么我们就不会否认，“利于他人即造福于社会”应成为做人的追求——这当中，做得好的人无疑是榜样，当他们的粉丝，实际是认同善良、积极的人生观，对己对人都有益无害。

港大授予姚明名誉博士学位的举动，等于宣告港大是姚明的粉丝，不是在于他的帅气、球技，而是在于他的社会贡献。其实，向造福于社会的佼佼者颁发

名誉博士学位，崇尚人人努力为社会作贡献的价值取向，在港大是传统，在世界是惯例，在我国现行《学位条例》中也规定可授予“国内外卓越的学者或著名的社会活动家”名誉博士学位。

正如姚明的粉丝那样，港大也是克林顿、何大一的粉丝，而回望历史，港大还是曾荫权、吴敬琏、陈竺、钱正英、金庸、德兰修女、曼德拉、李光耀等造福于社会的杰出人物的粉丝。这样当粉丝，虽与“主营业务”关系不大，却高度吻合“树人”终极目标。

谁要给姚明授“官”授“教授”，我会很反感，但港大给姚明戴名誉博士帽，我看没啥不好。

(祝俊初)

## 地方政府救经济要多点自选动作

■今日视点

在房贷新政及地方的配套政策刺激下，国内部分城市的楼市有了转暖迹象，但形势依然很严峻。

比如在陕西，统计数据显示：截至9月底，陕西省房地产投资增幅逐步呈现滞缓状态，商品房新开工面积和销售面积的步伐已经放缓。而在广州，4000元/平方米的最便宜限价房入市后却遭遇现场摇珠没有准买家到场的尴尬。

自10月底国家推行房贷新政以来，各地均纷纷出台配套政策以刺激市民买房。新政推行之后，一些地方的商品房交易量有增加的趋势，这是大家乐于看到的。但任何时候都不能把鸡蛋放在同一个篮子里。当前之形势，刺激住房消费只能被看成是救经济的规定动作，地方政府在配套房贷新政出台措施救楼市的同时，也应该在其他领域多做出一些救经济的自选动作。

以近来屡屡出现大企业倒闭的东莞为例，这个城市曾经以“中国制造”闻名于世，劳动密集型的制造业是东莞经济增长的主要引擎。由于东莞的制造业以出口为主，所以在全球金融危机下，这个城市就首当其冲，中小企业甚至是合资玩具厂这样的大企业倒闭减产的消息接踵而至。以东莞之现状，救楼市显然不是救经济的首要任务，救企业才是。遗憾的是，面对企业接连倒闭的现状，我们只看到东莞不断动用财政替企业偿还员工工资，并未见到有包括减免税费甚至奖励企业生产等专项措施问世。

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产业结构，有的或许是制造业，有的可能是IT业，有的则可能是旅游服务业。不同的产业结构，决定了这些地方在危机中冲击受力方面的差异和程度的高低，与此相对应，各地救经济的应对举措也应该各有重点。如果说各地已经完成了配合房贷新政救楼市的规定动作，那么，在

近日，媒体报道检验检疫机构在澳大利亚进口澳优能力多婴儿免疫配方强化奶粉检出阪崎肠杆菌问题，引起广大消费者关注。经查，该报道引用的是国家质检总局网站上发布的2008年7月进境不合格食品、化妆品信息表中的内容，该批产品在入境时检出阪崎肠杆菌，已由出入境检验检疫机构按规定处理，没有流入市场。

国家质检总局一直高度重视进口婴幼儿配方奶粉的阪崎肠杆菌污染问题，自2005年10月起就已将其列入进口婴幼儿配方奶粉的必检项目，凡检出者一律不得进口。目前消费者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的，经出入境检验检疫机构检验合格的进口婴幼儿配方奶粉，均符合国家有关卫生标准和要求，消费者可以放心食用。(以上文字源于国家质检总局网站，网址：www.aqsq.gov.cn)

11月6日，针对澳优能力多奶粉一批次产品由于受致病菌污染而被拦截于国门之外一事，湖南省出入境检验检疫局何处长指出：“所有进口食品都须经两道检测才能进入中国市场，一是经原产国出入境检验检疫局检测合格，二是经中国出入境检验检疫局检测合格。国内销售的进口澳优奶粉是每批次检验合格才能上市销售的。”

至于6月10日有一个批次的澳优能力多奶粉被检测不合格的事，何处长表示，已退回澳大利亚烧毁处理，这是一个惯例，包括国家质检总局于11月4日在官网所发布的191种入境产品全部被退回原产地，不得进入中国市场销售。

澳大利亚、新西兰是乳业非常发达的国家，惠氏、美赞臣、雅培三个进口品牌都是采用澳大利亚新西兰奶源，为什么进口澳优能力多奶粉会有一个批次抽查不合格呢？澳优乳品（湖南）有限公司CEO陈远荣先生解释说：“澳优能力多奶粉在澳大利亚出境时经澳大利亚出入境检验检疫局检测合格，经过分析排查，该批次奶粉的包装在海运过程中受到集装箱的污染所致。”澳大利亚从牧场到餐桌的质量控制体系全球领先，澳优的品质是安全可靠的。

最后，陈远荣还表示，退货是进出口贸易中很常见的一件事，澳优所有市场销售产品（原装和分装婴幼儿产品）都是经中国出入境检验检疫局每批次检测合格的，绝不让不合格的产品流入市场。

针对本地经济发展现状和产业实际救经济的自选动作方面，各地都还存在着比较严重的滞后现象。

11月7日的《现代快报》报道了流传于网络的“金融危机中20个不景气行业名单”。

网络传言当然不足信，但这也是各行业受冲击的一个侧影。地方政府在配合房贷新政救楼市的同时，应该清楚认识到本地产业受冲击的重点所在，并首先为本地的支柱产业输血救命。比如说，旅游业和绿色农业是海南的支柱产业，地方政府救经济的自选动作就应该首先围绕这两个行业展开。随着全球金融危机的进一步加剧，其对中国实体经济的负面影响已经日益呈现，甘肃静宁县苹果出口受阻8分钱一斤都没人要，只是危机加剧的一个缩影。危机当前，时间紧迫，如何在完成救楼市规定动作的同时，尽快做出救经济的精彩自选动作，考验着各地政府的智慧。

(本报评论员 赵勇)